



中国乡村·历史与现实

[美] 黄宗智 著

China's Hidde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中國經濟出版社

China's Hidde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

——

中國農業生產力革命

中國經濟出版社

[美] 黄宗智 著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 黄宗智著.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118 - 0994 - 0

I. ①中… II. ①黄… III. ①农业经济—经济史—研究—中国 IV. ①F3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1492 号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黄宗智 著

责任编辑 高山
装帧设计 乔智炜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787×960 毫米 1/16

印张 17.5 字数 228 千

版本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出版 法律出版社

编辑统筹 学术·对外出版分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印制 陶松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网址/www.lawpress.com.cn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 ISBN 978 - 7 - 5118 - 0994 - 0

定价: 34.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前 言

笔者在 1988 年之后虽然把主要精力从社会经济史转入法律史研究,但最近十年其实一直都没有放弃对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关怀。2001 ~ 2002 年间,曾经抽出一年的时间详细探究 18 世纪中国和英国农业变迁的异同。当时作出如此的选择主要是因为国内外在美化清代历史的大潮流下,出现了一些颇具影响但是比较荒谬的研究和分析。其后,2004 年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退休,隔年(现在是每年)在国内为研究生们开课,对中国的现实问题从消极的关怀(想而不写)转到积极的关怀,并把写作对象从美国的学术界转到中国的学术界。在此期间,发表了好几篇关于中国农村现实的论文,主要从历史视野来探讨当前问题的起源和可能出路。

2009 年年初完成了我的法律史第三卷的中英文稿之后,便把主要精力转回到农村问题的研究上来。在我看来,国内经济史和经济学领域近年来的趋向与法律史和法学非常相似,同样片面模仿美国 2008 年前二十多年在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下所形成的

学术主流,在法学界是法律形式主义,在经济学界则是形式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缺乏对其他学术传统的理解,包括今天已经再次成为美国学术界主流的法律实用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法学方面,笔者经过二十多年的耕耘,已经完成了详细论证西方现代形式主义学术多方面的不足的三卷本,虽然也同时论证并吸纳了其符合中国实际的部分。在农业和农村问题上,本书是和我法律史研究相似的第三卷,把我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书的经济史研究与当前的现实问题连贯起来,论证美国新古典经济学的众多盲点和误区,但也同时论证并吸纳了其适合中国的部分。

当然,此书和上两卷也有一定的不同:历史研究要求尽量做到参考所有能看到的材料,而现实问题的研究则一般不可能具备如此的条件,首先是因为材料太多,同时也因为现实牵涉面更广,而又不断变化,没有可能做到像历史学那样详尽的研究。本书研究的范围只可能是问题的局部,而且在相当部分的章节中,探索和推测多于结论。这方面本书与其说是前两本的第三卷,不如说是从历史视野对现实问题的一种初步思考。虽然如此,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尽量重新核对了此前发表过的各篇文章的内容和数据,作了相当幅度的重写、修正、删节和补充,然后再把它们和新写的章节连贯成此书。

笔者是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而发表此作的,深觉自己做得太少、知道得也太少;但另一方面,则被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所推动,觉得近年来国内这个学术和理论领域已经步上了歪途,越来越脱离农村和农民的实际问题。对国内众多对农村实际情况拥有深厚了解的农业干部和实践研究者来说,希望自己在经验实际方面的认识基本准确,而在理论方面起码提出了值得讨论的问题。当然,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此作为理解和解决当前的农村问题作出微薄的贡献。

这里要说明,在科学主义占据霸权地位的今天,“社会科学”研究者多倾向于探寻简单机械型的单一推、拉动力,而本书在这个层面上,有意识地采用了以下的因果观点:历史上许多重大变迁,像本书讨论的英

国农业革命(和其后的工业革命)以及中国当前的隐性农业革命,不会来自单一起因或动力,而更多的是来自几个不同的、独立或半独立的历史趋势的交汇。在那样的基本认识下,本书一再强调人口因素,目的绝对不是想争论人口是历史的单一决定性因素,而是要说明市场、资本、技术、制度/国家体制和社会结构等其他经济因素,必须和人口压力这个基本国情联系一起予以理解。

这十年来,众多同人和学生为我陆陆续续所写的中英文论文提供了有帮助的反馈、建议和批评:Perry Anderson, Robert Brenner, 崔之元、Joseph Esherick(周锡瑞), 冯小双、顾莉萍、Stevan Harrell, 贺雪峰、黄家亮、Chris Isett(艾仁民), 李放春, 林刚、彭玉生(Yusheng Peng)、William Rowe, Mark Selden, Matthew Sommer, 仝志辉、汪晖、温铁军、夏明方、严瑞珍、张家炎和周其仁。彭玉生还是第五章的合著者。在最后修改阶段,李放春、彭玉生、夏明方和张家炎为我看了书稿的部分或全部,再次提了有益的建议。我要特别感谢白凯(Kathryn Bernhardt)在全部写作过程中无数次的讨论、质疑和建议。我自己从2005年以来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开设的《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的历届研修班的研究生们学到很多,特别是余盛锋和高原,也从参与我们Modern China学术季刊2008年以来(与《开放时代》同时)发表的三轮《中国国家体制:中西方学者对话》的约二十位中外学者的交流中学到很多,在此一并致谢。

目 录

前言 001

第一章 导论 001

第一编 从内卷到隐性农业革命

第二章 18 世纪英国与中国:两种农业系统及其
变迁 027

第三章 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和现在
——舒尔茨理论的对错 063

第四章 土地制度、农业体系和发展出路 084

第五章 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
农业的前景 103

第六章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127

第七章 中国的新时代小农场及其纵向一体化:
龙头企业还是合作组织 138

第二编 中国的现代社会形态

第八章 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
理论 163

第九章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 社会形态	193
第十章	跨越左右分歧:从实践历史来探寻 改革	210
第十一章	结论: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经济史和 经济学	226
	参考文献	243

第一章 导 论

农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农业劳动力产出或产值的提高。显然,在农业人员占大多数的国家,如此的变化乃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键,也是现代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应区别于不附带劳均产出增加的总产量上升,譬如,来自耕地抑或单位面积劳动投入扩增的总产量上升。后者即我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乃是中国明清以来至少六个世纪中农业变迁的主要型式(Perkins 1969; 黄宗智 1986, 1992)。今天,在经历了三十年的“经济奇迹”之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位,并多半将在二十年中超过美国而达到第一位,然而人口压力和农民收入低仍旧是主要问题。

但是同时,中国农业今天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发展契机。这主要源自三大趋势的交汇:1980年代以来人口生育率的显著下降和其所导致的1990年代以后新增劳动力的递减;快速的每年约1%的城镇化以及大规模的非农就业;人们食品消费和全国农业结构

的转型,从低价值的粮食转向更多的高值农产品,既是进一步资本密集化也是进一步劳动密集化的、能够吸收更多劳动力的农业。结果是农业劳均产值持续上升,在近三十年中达到平均年5%多的增长率,总共上升了不止五倍,远远超过一般意义的“农业革命”。

但在国家政策上,当前还有许多尚未确定的抉择。中国的发展方向是否将会是比较简单的资本主义模型(虽然是具有庞大人口压力以及众多贫困民众)?抑或将是一个分配比较平均的发展?或者说,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历史经历是否会和后三十年的市场改革以某种方式合并为一体,抑或是完全被抛弃?

第一编 从内卷到隐性农业革命

本书首先对中国的农业作历史和比较视野的回顾——历史视野是为了超越意识形态;国际比较则是为了在全球视野中更清晰地指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别与共同之处。

中国与英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相比

本书从18世纪中国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和英格兰之间的比较开始,说明中国农业变迁之与西方典型农业发展的不同(见第二章)。中国是高度劳动密集的单一种植业农业制度,平均每个农场仅1.25英亩,英国的则是低劳动密集的混合种植业和牧业的农业制度,其农场平均规模达125英亩。^[1]在长江三角洲,牲畜放牧和饲养由于人口压力而基本被排除。正如农业家卜凯(John Lossing Buck 1937a: 12)多年前指出,供养肉食人口所需要的土地是供养粮食人口所需土地的六七

[1] 英格兰北部的农场平均100英亩,南部150英亩。(Allen 1994: 99; Huang 2002: 511)

倍。英格兰则具有足够的土地来支撑一个“肉食 + 农作物”的农业制度。^{〔2〕}如此不同的土地/人口“要素禀赋”严重抑制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 18 世纪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农业变迁主要体现在单位面积土地劳动投入的增加。例如，从水稻转入棉花，其所需要的劳动投入是水稻的 18 倍（包括纺纱和织布），其收益则远远不到那样的比例；又例如，从水稻转入蚕桑，所需要的劳动投入是水稻的九倍，其收益则才三四倍。如此的变化也可以视作（我称为）“内卷型商品化”，因为从粮食转入棉花/蚕丝生产意味着进一步的商品化。其结果是总产值的上升，但是是以单位劳动力或劳动日产出/产值的显著递减为代价来做到的。在 18 世纪的英格兰则很不一样，每劳动力的产出上升了几乎一倍，主要得助于畜力的使用。这是在圈地运动之下，系统混合种植业与畜牧业（此前在共有土地上放牧）的结果，其典型是所谓诺福克的“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轮作制度，小麦和大麦供人食用，芜菁和三叶草用来喂牲畜和恢复地力。正如瑞格里（Anthony Wrigley 1985）证明，如此的劳动生产率上升意味到了 18 世纪末，仅占总人口 1/3 的农业人口，能够为其余的 2/3 的人口提供足够的食品。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后来的经济变迁作出了一系列的贡献：它为非农部门释放了劳动力，首先是城镇的“早期工业化”的手工业，继之是后来的制造工业。同时，农业收入的上升也为当时（包括农村在内的）“消费革命”提供了条件。城镇化与蓬勃的城乡交换，导致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展望和抽象化的分工、竞争、规模经济效益以及螺旋式经济发展（Smith 1976〔1776〕：401 - 6）。此外，城镇早期（手）工业发

〔2〕 这里，有的读者可能会联想到印度多牛的事实。此中关键在于印度基本不食用牛肉，只用牛奶。有人如此解释：“美国每 16 磅喂牛的粮食和大豆只能生产一磅我们食用的牛肉。其他 15 磅我们是吃不到的，要么被牛作为能量消耗掉，要么被用来生产不可食用的身体的部分（如毛与骨头），要么被排泄掉。牛奶则效率较高，每一磅饲料可以生产 1 品脱（pint，即 0.125 加仑）牛奶（部分原因是我们不用每次挤奶就重新饲养一头牛）引自 Frances Moore Lappe, *Diet for a Small Planet*——Winter, n. d.。

展(主要是纺织业)为人们提供了在家庭农场之外的可能生活来源,因此导致了“人口行为转型”,主要是较早结婚和较高的结婚率。另外,科学和技术革命为工业制造业提供了条件,其能源则来自英格兰早先发展的煤炭业(毋庸说,后来不列颠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掠夺和榨取也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特殊条件)。以上众多半独立半关联的变迁的交汇构成了不列颠工业革命的起源。

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的不同鲜明地体现于“早期工业化”的不同。在英格兰,早期手工业发展很快便变成一个城镇的现象,其劳动者由此得到了独立于家庭农场的生计,而那樣的独立能力允许他们较早结婚和更高比例的结婚。这是瑞格里和 Roger Schofield 等人所研究和证实的现象(Wrigley 和 Schofield 1989 [1981]; Levine 1977)。

在中国,棉纺织则和家庭农场紧密缠结,相互依赖,不能分别为人们提供生计。棉花种植与纺纱和织布形成了所谓“花、纱、布”“三位一体”的农场生产组织,分别为一个农户提供其部分生计。属于上层阶级消费品的丝绸生产则稍有所不同:其植桑、养蚕和缫丝被整合在一个家庭农场之内,但需要较昂贵的织机和较高技术的丝织这一环节则多被分别开来,并能为其工作人员在城镇提供生计,高档丝绸产品尤其如此。虽然如此,中国农家的手工业(贴切地被称作农家的“副业”)与 18 世纪英格兰的早期工业化以及伴之而来的城镇化的差别仍然非常鲜明。

中国的经历之所以与英格兰不同,其关键在于其人口和劳动力相对过剩。这是我在第三章与农业发展理论家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对话的中心论点。舒尔茨的论点来自一种原教旨市场主义视角,他认为,即便是在印度(和中国)那样的传统农业经济中,由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人口过剩不可能存在。他从理论前提出发,认为劳动力必然和其他的生产要素一样,乃是个稀缺资源。为此,他拟造了一个“零价值”劳动力的稻草人来论证理性经济人不可能为零报酬而劳动。但是,我们对中国 18 世纪到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的现代农业投入

(化肥、科学选种与机械化)的中国农业的详细回顾则说明与此十分不同的历史实际。事实是,市场经济必须和人口压力联系在一起予以理解,而不是像舒尔茨那样将两者隔离开来,无视人口压力。符合实际的概念是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和报酬递减,不是零报酬的绝对过剩。以上提到的“内卷型商品化”便是很好的例子。

在英格兰之外,另一个比较对象是日本。人们也许会认为日本是“东亚模式”的典型,与中国相似,其土地/人口比例远低于英格兰。但进一步的检视说明,日本和中国十分不同。首先,它得助于较早的人口转型,早在明治维新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中便已进入低人口增长状态(Smith 1977; Hanley 和 Yamamura 1977)。其后,在1880到1950年代现代投入(主要是化肥和科学选种)进入的时期,因为工业蓬勃发展并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其农业人口总数基本没有增加(Hayami, Ruttan 和 Southworth 1979: 11-12)。结果是现代投入所带来的效益几乎完全呈现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达到每年2%的幅度,也就是说,每36年便翻一番。(Yamada 和 Hayami 1979)。在日本的模式中,农业革命不一定起到了引擎的作用;但其更显著的是工农业的相互推进。

与此十分不同,中国在其现代投入进入农业的时期,即1950年到1980年间,人口每年增加约2%,而农业产出则每年只提高了2.3%(Perkins 和 Yusuf 1984: 第二章)。结果农业变迁的型式主要是单位面积劳动投入进一步密集化,而不是借助现代投入来节省劳动力或提高劳均产出,最后是农业劳均产出/收入几乎停滞(以每劳动日计算,则完全停滞)。工业则在同时期中每年平均增长11%。结果是国民经济中非常显著的城乡差别。这段时期的中国经验可以描述为没有农业发展的工业发展。(Perkins 和 Yusuf 1984: 第四、六章)

中国此时期的农业变迁型式的一个生动的例子是,拖拉机在长江三角洲所起的作用:它没有导致劳动力的节省;反之,是导致了进一步的劳动密集化。拖拉机促使此地农业在水稻和冬小麦之上再加上一茬,变成“早稻+晚稻+冬小麦”的一年三茬制度。拖拉机的来临使八

月初在十天之内“抢收‘早稻’”“抢种‘晚稻’”的“双抢”成为可能。在11月份的抢收晚稻抢种小麦同样。但第三茬的种植意味着每劳动日报酬的递减。化肥和高产品种的介入因此并没有导致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黄宗智 1992; Perkins 和 Yusuf 1984)。

当然,国家为了保证城镇供应而在计划经济下强制压低农产品价格(也是为了增加从农村提取的剩余,用来发展城镇和城镇工业化),也是农业生产劳均产值偏低的重要原因,结果是更加严重的城乡差别。

另一能说明问题的是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比较,它们也属于所谓“东亚模式”,是在日本之后的农业现代化例子。它们与中国农业的不同主要来自在日本殖民政府统治下的那段历史。殖民政府的目的虽然是为了日本本国而不是其殖民地的利益,但是在农业方面确实带来了一些重要的现代化措施,包括灌溉面积的扩大以及化肥和科学选种的供应。

在中国台湾地区,农业人口虽然和后来中国内地一样,每年增长了约2%,但是,其农业产出增长得更快,在1917年到1937年达到每年3.6%的幅度(Teng-hui Lee [李登辉]和Yueh-eh Chen 1979: 78)。Samuel Ho证实,在1910年到1940年间,化肥投入提高了7.3倍,此外则是科学选种,都主要由殖民地政府提供(Samuel Ho 1968: 318)。Alice Amsden在她的总体回顾论文中,估计农业劳均生产率在日本统治的50年中,大约增加了一倍(Amsden 1979)。也就是说,相当于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幅度,而且是在约一半的时间之内做到的。^[3]它为后来的经济发展作了铺垫。

韩国农业的经历则介于台湾地区和中国内地之间,其人均产出要高于中国,但低于台湾地区。与台湾地区相似,其农业现代化始于日本统治时期。Kenneth Kang和Vijiaya Ramachandran证实,日本殖民政府实施了两大政策:一是扩大灌溉面积16倍,从1万公顷到16万公顷;一是提高化肥使用,从1920年的1.5公斤/公顷到1940年的208公斤/公

[3]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台湾,国民党领导阶层和当地地主阶级并没有像在大陆那样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比较容易实施土地改革。

顷(Kang 和 Ramachandran 1999: 792, 表 6)。在此期间,韩国农业人口每年增长了 0.87%,但是农业产出的增长则多得多。韩国学者 Song Hwan Ban 说明,农业产出增长率虽然在 1920~1930 年间只达到 0.5% 的幅度,到了 1930~1939 年间,提高到年 2.9%,主要来自高产的水稻科学选种和与之相应的化肥投入(Ban 1979: 92-3)。Ban 论证,在 1918~1971 年间,韩国农业劳均生产率平均每年上升了 1.4%,也就是说,总共翻了一番还要多(Ban 1979: 105)。

毋庸说,如此的发展背后还有众多其他的因素,尤其是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正如许多分析者指出的那样。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到后来大量(相对于台湾地区和韩国经济规模而言的)美援所起的作用,它不仅援助了农业发展,也促使非农发展达到能够吸收足够劳动力的程度,使台湾地区和韩国能够避免像中国内地那样的内卷型变迁。正如 Ban 指出,美国政府在提供化肥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这是所谓“绿色革命”的根本条件(Ban 1979: 112)。农业劳均产出因此能够达到比农业人口增长要高出一定比例的幅度,结果是比中国内地要高得多的人均产出和收入。而那样的发展则使类似于英国经验的城乡交易(以及农产品出口)成为可能,促使台湾地区和韩国在 1980 年代末便在人均 GDP 上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为了给这里的讨论一个量的纬度和概念,我们不妨看一下比较经济史家 Angus Maddison 对以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 GDP 的合理估算。我说“合理”,是因为他没有受到新近来自意识形态时尚的影响,这一时尚试图论证 18 世纪中国没有人口压力,坚持 18 世纪英国并没有经历一个农业革命,借此来满足其所谓“去西方中心化”的愿望。^[4]我说

[4] 引用 Maddison 本人的话来说明:“(Paul) Bairoch……提出,1800 年的中国要比西欧发达……他从来没有为这个十分不可能的图像提供证据……Andre Gunder Frank (1998: 171, 284) 则引用了 Bairoch 而写道,‘1800 年前后,欧洲和美国,在长时段落后之后,突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赶上了亚洲’。彭慕兰(Pomeranz 2000)引用 Bairoch 的时候比较谨慎(第 16 页),但他对(清代)中国的情有独钟则促使他得出同样的结论。他说(第 111 页),‘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西欧人在 1750 年,甚或 1800 年,比他们同时期的、高人口密度的‘古老世界’区域具备更高的生产力’”(Maddison 2001: 47)。

“猜算”，是因为关于传统经济的数据一般都来自轶事性的证据，而不是现代的系统统计。但 Maddison 那样的猜算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因为它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一个大约的量的概念，可以视作数字化的叙述。关键问题仍然是这些数字经不经得起我们上面指出的质性逻辑的检验。表 1.1 汇集了 Maddison 和我们话题有关的数据。

表 1.1 中国与相比国家和地区的人均 GDP (国内生产总值), 1700 ~ 2003 年
(以 1990 年“国际美元”计算)

年份	不列颠	中国	日本	台湾地区	韩国	印度
1700	1405	600	570			550
1820	2121	600	669			533
1913	5150	552	1387			673
1950	6907	439	1926	936	770	619
1978		978	12 584	5587	4064	966
1998	18 714	3117	20 413	15 012	12 152	1746
2003		4803	21 218			2160

资料来源：Maddison 2001：90，表 2 - 22a；Maddison 2001：304，表 C3 - c；2003 数据来自 Maddison 2007：44，表 2.1

在以上的讨论中，已经说明了这些数字背后的动力：英格兰如何在 18 世纪便已走上现代人均产出发展的道路，远在中国之前；日本如何能够在 1880 年到 1950 年间便成为亚洲第一个进入这样的现代发展的国家；台湾地区和韩国如何在 1950 年之后，得助于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基础，进入了现代人均 GDP 发展。Maddison 的数据，如果谨慎看待，可以为我们提供以上质性叙述的量化纬度。

正如 Maddison 的数据所显示，中国农业的历史经历最终与印度最为相似，远远超过英格兰所展示的西方经验以及日本和台湾地区/韩国所展示的“东亚模式”。其部分原因是两国相对其人口而言的土地资源短缺以及其土地/人口比例日益下降的这两个共同点。在这样的限制之下，1960 和 1970 年代的所谓“绿色革命”只起了很有限的作用，两国